

绪论

一、当代文学精神的整体性把握

1949 年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中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纪年。

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这一历史性转折，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同时，这一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这一现实环境中存在和发展的文学也需要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规范、期待和追求。无疑，时代的转换赋予文学以不同于此前的性质、使命和特征。基于此，以 1949 年为界，文学的社会学研究者把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分为“现代”和“当代”两个不同阶段。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提法，最早出现在上世纪的 50 年代后期。当时，为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命名”是提出

这一概念的最主要的动机。70年代末，它已经得到广泛运用。自80年代以来，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处理这一概念上出现分歧。他们对这一名称的“科学性”提出怀疑，也质疑“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两分法，强调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寻求另外的概念和分期方法。继续使用“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则已赋予它各不相同的含义。^①

不可否认，名称、概念、分期的改变的确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是，已经出现的新的文学史写作范例与实际操作状况显然滞后于理论倡导的预设价值及其有效性。可以说，具体实践并没有达到理论上的高度。目前看来，现在的文学史研究还没有具备发生实质性转换的足够条件。因此，考虑到实际情况，这里继续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概念。而且，作为把握中国文学整体形态的一个概念、一种视角，它仍然是有效的，并不过时。

文学史观不同，文学史的类型和表现就不同。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有侧重社会学角度的，有侧重文艺运动、文艺思潮角度的，有侧重艺术审美角度的，也有侧重文体形式角度的。“中国当代文学精神”虽没有直接出现“史”的字样，却显然具有“史”的性质。这里强调“精神”二字，便内在地蕴含着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念。首先，它表明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性存在；其次，它侧重的是在这一整体性存在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流变”的历程。反映这一整体历史阶段精神特征的中国当代文学，具有着与社会生活实践同步探索的性质。而在这—精神流变的整个历程中，便自然地包含着时代的发展精神和文学自身的变革精神。同时，两种精神没有高低与主次之分，二者是密切交融、相辅相成的关系。

早在1980年，茅盾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所写的“序”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中明确指出：三十年来我们的作家队伍是大大壮大了，涌现了“风华正茂”的第二代、第三代新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质量和题材面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前。^①如今，新中国文学已经有了五十余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阶段内，中国文学经历了艰难险阻，始终在曲折和迂回中前行。它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有着沉痛的教训。《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写作始终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和“流变性”特征，紧紧围绕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发展精神和自身变革精神，注重文学精神与各类具体文学创作的有机统一，史论结合，既共时性地概括了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整体形态，又历时性地梳理了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流变轨迹，不仅总结了当代文学的巨大成就，而且尤为注意到其间的波折与不确定因素，指出了经验与教训，融入了批判与反思，力求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二、当代文学精神的流变历程

中国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精神有一个逐步确立的过程，并且在建国后的各类文学艺术形态中都获得了充分体现。当然，其间又存在着对于社会主义精神的狭隘、错误的理解，造成了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文革”之后，社会主义文艺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精神重新得以恢复并获得了开放式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是由百余年来中国特定的社会生活所决定。对这一问题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是与事无补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并恰当地处理文学作品中的“政治”。这里的

参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牛运清主编《长篇小说研究专集·序》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政治应该是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文学艺术总是体现着一定的思想、情感和政治倾向,只要它能促使人类向着真、善、美追求,都应当得到政治上的肯定。而且,文学中的政治必须是经过充分艺术转化的,有机地消融在艺术作品中。问题不在于文艺是否涉及或反映了政治,而在于其间有没有经过尽可能充分的艺术转化,从而成为真正的艺术品。建国后一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学创作,之所以存在着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弊病,成为说教性的劣质品、非艺术品,引起今天人们的反感,根本原因就在于忽视或者缺失必须的艺术转化。急功近利的政治目的,遮蔽了创作主体的艺术自由和审美眼光。

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改革开放题材文学成为当代文学社会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鉴于“文革”前许多“跟形势”“写政策”“写中心”的文学作品大都成为过眼烟云,亦鉴于对“题材决定论”的反感,一些作家在改革开放的新生活面前困惑、彷徨。实际上,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环境跟过去已经有了本质不同,“写什么”和“怎么写”成为作家自己的事情。改革文学是社会主义多元并存文学中的一元,它不会成为极“左”思潮下的“主题先行”“写中心”“为具体政策服务”的复归与翻版。“写中心”文学是在“文艺从属于政治”和“工具论”思想指导下,限制、束缚作家的主体意识,硬要作者写自己不熟悉或不愿写、不能写的东西,把文艺等同于宣传,变成时代的传声筒。因此往往为了政治牺牲艺术,把文学创作变成公式化、概念化、庸俗化的应景之作,成为标语口号。而改革文学则是自由的文学,是作家面对大变革的浪潮,自觉自愿为时代留影,为人民“鼓与呼”的文学。在当今文学创作日趋边缘化、私人化、商业化的情况下,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呈现卓尔不群的美学品格:即强烈的时代感、使命感、真实感、悲壮感,以及揭露问题、干预生活、扶正压邪、震撼心魄、净化灵魂的警策作用和认识、教育功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and 思想穿透力,引起读者共鸣。对真、善、美的追求,正是社会主

义时代精神的最大体现。

美国著名作家赫姆林·加兰在其《破碎的偶像》中说过一句传世名言：“为一切时代而写作的最可靠方法 就是通过最好的形式 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在。为别国写作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忠于自己的祖国，忠于那些我们热爱的——朴素地爱，像人那样爱的——地方和人。”爱国主义情结同样是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一个极为显著的时代特征。1949 年不仅开创了以人民共和国为标志的新的政治时代，而且开创了以爱国主义为标志的新的文学时代。作家们正是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奏响了以爱国为主旋律的新中国文学创作高潮的第一乐章。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国当代文学的爱国主义精神恰恰是这一传统在特殊年代的继续发扬和光大。而且，也是当时时代政治形势、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这种精神还是人民群众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单纯、浓郁、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是文学创作中的时代精神的显著特点。它的突出成就，集中体现在再现历史、讴歌建设、反思弊端和塑造新人等几个方面。中国当代文学的爱国主义精神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是不断发展的，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无论何时何地，爱国主义精神都闪烁着永恒的魅力。今天，立足于新世纪的起点，重新审视爱国主义情结，不难发现创作中明显存在的偏颇和失误。简单化、理想化、模式化是其最突出的表现。当代文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创作上如何获得新突破，是当代中国文学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一个紧要课题。

与爱国主义精神相同步，英雄主义精神也是贯穿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条基本的精神脉络。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从英雄主义文学开始的，英雄主义赞歌是这个时代的主导风尚。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是与革命相伴随的，革命英雄形象在当代文学中便具有特别的魅力。它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不仅深刻影响了当代，而且远远泽及后

代。不无遗憾的是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 出现了英雄塑造的形而上学化和神化的偏向。随着文艺新时期的到来，神化英雄的弊端亦多获纠正。作家们冲破了写英雄人物的陈旧藩篱，进行了开创性的艺术营造。一批体现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具有着鲜明的精英意识、闪耀着眩目的理想光彩、充溢着独特的英雄气概而奋斗于不同领域的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呈现于文坛。多样化的英雄形象在折射时代精神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和艺术的立体感。在英雄主义精神的表现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偏向，那就是乐观主义占据主流，而缺少悲剧意识。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悲剧？社会主义文学能否写悲剧？新时期文坛创作实绩对这一论争作出了肯定性回答。尤其是英雄悲剧作品的大量涌现 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新的开拓 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精神开始转向深沉并逐步走向成熟。

文学是人学，中国当代文学精神自然关注到这一点。如何表现人性，张扬人道主义精神，便成为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 20 世纪 50 年代“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背景下 不仅出现了诸如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岳野的《同甘共苦》、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等富有人情味的小说、话剧作品 而且在理论战线上 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等先后发表文章，自觉有意识地呼唤人性与人情，呼唤人道主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对整个政治形势的分析出现偏颇，有关人性与人道主义的创作与理论均遭到严厉批判。文艺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致使谈“人”色变。及至文艺新时期到来 人性、人道主义在思想解放精神指引下重新获得全面的复苏。反映人性、人道主义的各类作品，涌现于新时期文坛。尽管对此发生了争论，但却是畅所欲言，已经没有了此前论争中浓郁的政治斗争色彩。理论界逐步对人性、人道主义达成了肯定性共识，并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中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与探索。不过，在张扬人道主义精神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比如 在对历史的描写中 过分夸大人性、人道主义的作用 在对性爱的描写中 从禁欲主义走向纵欲主义 在商品经济冲击下 物欲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歪曲与压抑，等等。这些都是应当进一步注意的问题。

在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中，任何新人物形象、新性格类型的创造都是对文学史的艺术新贡献。女性解放是衡量人的解放的尺度。女性形象的塑造，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重要体现。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妇女形象，是过去的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崭新的艺术形象。她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妇女已经从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女性写作在主流叙事中，使作为一般形态上的人性在文学中获得了审美价值，进而作为特殊形态的人的性别特征也就更有理由进入审美的视域。在强调人的价值、恢复人的尊严、呼唤人性中 女性发现了自身的全面失落 于是，在争取男女平等中，女性写作开始进入到性别角色，女性意识获得自觉。于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女性文本的全面建构。 20 世纪 90 年代，女性文学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写作者之众，作品数量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如何走出狭隘封闭的自恋情结，走出日益商业化的误区，在广泛的社会人生中关注女性本体，则成为当前女性写作必须正视的问题。

时代精神是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重要表现维度。这里，可以以老舍先生的创作为例，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素以描写城市中下层人民悲惨屈辱生活见长的老舍先生，在人民共和国初创时期，为我们留下了一部英雄乐章——中篇军事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从老舍先生创作史上看，这部作品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它是惟一的一部表现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正义战争的小说；就艺术成就而言 它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组最文明、最勇敢、最爱国的拔山扛鼎、所向无敌的革命英雄形象，这标志着老舍本人在刻画理想人物和英雄人物方面登上了高峰，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突破。你无论读老舍上世

纪 20 年代写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还是三四十年代创作的《月牙儿》《骆驼祥子》《离婚》《牛天赐传》《四世同堂》等 都有一种压抑之感，有一种悲愤情绪萦绕心头，甚至闷得透不过气来。当读到 他写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的《方珍珠》《龙须沟》时 你会有一种旧貌换新颜的喜悦和欣慰 但是直到读了《无名高地有了名》时 你才会产生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扬眉吐气的自豪感！老舍求索多年，梦想多年的理想、信念、力量 都凝结在一组志愿军英雄形象上面。所以 我们必须纵观老舍思想、生活及其所描写的理想人物的发展轨迹，才能理解老舍创作《无名高地有了名》的动机与起因不是偶然的。应当说，这种现象恰恰是时代精神的折射。

三、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的承传与更新

文学自身变革精神是中国当代文学精神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

五十余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始终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精神的文学。建国之后的前 30 年，文学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一元化的文学 这很容易理解。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开放，西方非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进入中国，文学创作开始出现所谓的“现代派”甚至在 80 年代中期出现了新潮诗歌、新潮小说、新潮戏剧的创作高峰。即使在这样的情势下，现实主义精神仍然占据中国文学的主流。新时期以来得以恢复、深化并获得突破和发展的现实主义文学，无论从数量、质量、影响乃至艺术生命力方面都超过现代主义文学而处于主潮地位。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现实主义精神的演变过程。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密切结合，谓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50 年代后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革命”的前提下结合 谓之“最理想”的创作方法；60 年代初，现实主义获得短暂深化；

“文革”时期现实主义被歪曲；70年代末，现实主义得以恢复；80年代，现实主义出现开放、发展的局面；90年代，现实主义再度掀起“冲击波”。半个世纪以来，虽起伏有变，但始终在发展。其间，最不可忽视的便是它的批判精神。在社会生活和矛盾焦点面前，是揭露矛盾、鞭挞丑恶、张扬真善美，还是掩盖矛盾、粉饰现实，自然成为真假现实主义的试金石。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感召下，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曾经掀起一个短暂的高潮；“文革”期间，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几近丧失；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以其特有的批判精神最先呈现文坛，并且获得了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多元发展时期，现实主义依然体现出明显的批判意识；到了90年代及至世纪之交，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倾向。即便如此，批判意识仍然蕴含其中。

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学滑向了“假、大、空”“瞒和骗”，现实主义沦落为虚假的现实主义，即伪现实主义。相对于众所周知的主流文学而言，一股“地下文学”的精神潜流则试图冲决政治与权力的专制地壳，遂成为那一特定时期文学精神的真正代表。在当时的文学体制处于权力控制之下的情境中，诗歌成为“地下文学”取得最为突出成就的文体。在本质上，诗歌文体在“地下”诗人的创作中被赋予了一种具有鲜明反叛品格的浪漫主义精神。“地下”诗歌，在“黑暗和血泊”中升起了亮丽的光芒，成为反抗黑暗的精神闪电。同时，在那样一个文化专制的年代，“地下诗歌”便具有了一种文化启蒙的意义。而且，它还身处于大劫难中的个体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成为反抗绝望的精神资源。“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的浪漫主义反叛精神，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真正精神。

中国当代文学精神最深刻的变化还体现于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的变革。某种意义上，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变化。文学观念不断变化更新，才能对文学审美因素产生新的审美认同和共鸣，才能推进文

学美学的新发展。虽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已经有某些新质出现,但此时在艺术观念上并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在艺术形式和手法上有某些创新。真正的艺术变革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随着西方现代哲学、现代文论和现代作品的纷纷译介,加上“文革”后普遍存在的怀疑情绪和到处弥漫的文化失落感,为接受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社会心理土壤。更重要的是,文学自身突破旧有格局的自觉要求,成为借鉴、吸收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内因。这样,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便融入了浓厚的现代主义因素,诸如意识流、荒诞、寓言、象征等。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变革精神不仅表现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和吸收上,而且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继承和创新上。文学开始尊重自身的审美属性,散文化小说、市井小说、文化寻根小说具有代表性。艺术形式上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促进了艺术观念的变革。

1985 年是文学新思潮、新观念竞相登台的一年,各种新的观念、流派、形式、技巧开始更替出现。他们的文本极为注重形式试验,以全新的艺术观念颠覆了传统的美学规范。同时,在花样翻新的艺术观念变革中,也潜伏下疏离当前文化环境、受到读者冷落的危机。这样,1989 年之后,现代主义小说开始出现新的自我调整,那就是逐步减弱形式实验,终止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重视故事情节,重建理性深度,追求价值意义。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先锋派作家大都脱去了形式实验的外壳,生存的苦难、精神的困境以及人类的沉沦与拯救过程,成为创作的核心内容。

中国当代文学精神在文学观念和美学形态上的变革,标志着中国文学向世界文学的接近和认同,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从民族传统向现代化方向的迈进。然而,从其流变历程来看,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同样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悖论性存在应当引起重视。

四、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从事文学研究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整体形态作了横向的和纵向的梳理之后，有必要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尽可能有效而又简明的“定位”。在我们看来，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但走向世界并不是一味走向西方。任何民族和国家的文学要取得世界性认同，都不可能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其他民族和国家。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自有其不同的文化传统。因此，只有立足本土，以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创造去参与世界的对话，才有可能对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早就说过：“每一个国家的文学，主要是自己的民族传统，这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外来思潮，不管什么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也好 浪漫主义也好 象征主义也好 古典主义也好，要在这个国家里生长，必须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欣赏习惯、美学兴趣等等，慢慢地和原来的传统融合，一部分被抛弃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风格才能建立起来。”^①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学界正在逐渐摆脱借鉴、模仿乃至照搬外来文学的阴影，并且大力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的创造性发展，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应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努力的方向。立足这一目标，继续关注人的生存，将使文学艺术真正成为人类的终极追求。因为，文学的永久生命就在于，它不同于一切现世的物质力量而存在；文学之为文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能抚慰心灵 给人希望 教人挚爱 进而完善人类生存。

唐弢：《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 载《文史哲》编辑部编《治学之道》第 56～57 页 齐鲁书社，1983。

第一章 当代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精神

1949 年新中国诞生，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的新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当代文学”。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凡是属于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总要反映到文艺领域，从而引起文艺性质的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革命文学界努力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思想指导，以反帝反封建作为基本任务，文学所体现的主要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新中国的成立，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阶段的开始。此时，社会主义已经不再如此前那样只是一种理想或思想体系，它逐步成为一种现实。所以，体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建立、巩固、发展和完善，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使命。无庸讳言，中国当代文学走的是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

其间充满着艰难与曲折。但总体来说，它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一点不容怀疑。

中国当代文学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精神就成为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学精神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精神。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美学的批评方法综合考察，不难发现，从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精神的初步确立到它在文学艺术形态中的充分体现，以及对于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精神的不同理解，直到它的恢复与获得开放性发展，其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历史地梳理与研究这一精神历程，对于更好地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文学的社会主义精神的确立

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文学史同样如此。因为，文学不仅是一种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我们无论持哪种文学观念，都无法割断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精神的确立，也同样不能脱离这一点。

社会主义时期艰难曲折的历史、绚烂壮丽的生活大大不同于此前，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精神发育、成长的肥沃土壤，这一点自不待言。重要的是更应该注意到世界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传统对于确立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精神所起的作用。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不能是无根的文。无产阶级的文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就已经诞生。建国以后我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是“一边倒”所以对于世界文艺思潮的接纳，苏联文学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甚至连他们领导文艺的方式和方法也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楷模。而且，主要是系统翻译介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理论著作，这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对于当代文学精神也具有潜在的

思想影响和实际的指导作用。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高举无产阶级文学旗帜，维护了革命文学的实绩。1942 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从而开创了革命文艺的新局面。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的指导思想和文学观念都是按着《讲话》精神得以确立的。而且建国后我国的文艺领导、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的中坚力量也都来自解放区。文艺往往是一个时代的前奏。于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文艺事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上了日程，这便是 1949 年 7 月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继承“五四”新文学革命传统和发扬延安文艺精神的基础上，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起点。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集中体现在几个报告上，即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7 月 3 日）茅盾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关于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7 月 4 日）周扬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7 月 5 日）周恩来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7 月 6 日），郭沫若的报告在总结“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主要就文艺运动的性质和方向发表了原则性意见。而茅盾和周扬的报告分别从国统区和解放区这两个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殊途同归，都讨论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和人民大众相结合、贯彻执行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重要性。这成为新的社会主义文艺精神的核心。茅盾强调指出，“在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飞跃过程中”，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周扬特别指出毛泽东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就是“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他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为题，介绍说明了解放区的文艺创作。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人民群众相结合，虚心学习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立场，致力于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并在人民军

队、人民政权的扶持下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下，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民文艺，把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实际上已经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雏形。根据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周扬还就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贯彻工农兵文艺方向，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问题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他认为，创作的重点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因为工农兵群众是解放战争和国家建设的主体”；“工农业生产建设的主题将获得新的重大的意义”；文艺作品“必须揭示社会中一切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写出反映革命战争的‘伟大作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智慧，而且“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关于如何全面地理解 and 实践工农兵文艺方向，周恩来在报告中作了详细的阐释。他指出：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在未解放以前的情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写封建农村的农民，就要写到地主的残暴；写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写到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些无谓牺牲的士兵和那些反动军官。所以不是说不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劳动人民。但后来的事实却偏离了这一正确理解，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狭隘地理解为“只能写工农兵”，因而造成了创作题材的狭窄和人物形象的单一。

可以说，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针和总路线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就已经得到了初步的确立。与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我们必须有崭新的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是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它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熟悉工农兵，深入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创造出有利于人民团结奋斗、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

文艺作品。这是历史的使命。它的文艺观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具体地说就是运用革命现实主义方法认识生活、表现生活。实际上这是《讲话》中已经确立了的文艺观念，这里又重新继承它的精神，将革命现实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这样就从文艺方向、文艺路线、文艺观念、创作方法诸方面，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精神。紧接着，1951年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现在看来，事件的发生有它的内在的历史原因，也有着现实意义和明显的消极影响。但仅从文艺发展这一角度来说，实际上就是为了从创作方面排除非革命现实主义创作观念的影响，从而确立起符合唯物史观要求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绝对指导地位——创作必须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生活、反映生活。

社会主义中国前进的步伐不断加快。建国初期的四年间，完成了土地改革，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党在1952年底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文学艺术作品适应新的形势，于是，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就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背景之下召开了。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作为思想战线上重要一翼的文学艺术，在过渡时期中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以文学艺术的方法来促进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帮助社会主义基础的逐步增强和巩固，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逐步完成。”周扬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在文学艺术战线上，“必须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继续进行批判的工作”而且“必须反对文学艺术创作上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它一切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都是“长期的任务”。茅盾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只有

坚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真正实现文学的任务。文学应该通过真实的描写“去教导广大人民不仅正确地认识今天的现实，并且认识明天的现实，教导他们在这种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改造自己克服障碍，担负起建设祖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这就必然涉及到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问题。对此，会议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而与这一准则相适应和联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塑造新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周恩来指出，“今天文艺创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歌颂的方面”；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应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使之“成为人民学习和仿效的对象”以帮助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于是“应该把人物写得理想一点”；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周扬在报告中也强调了创造新英雄人物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要求我们作家去熟悉人民的新的生活，表现人民中的先进人物，表现人民的新的思想和感情。”文艺作品所以需要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是为了以这种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的和落后的事物作斗争，不应将表现正面人物和揭露反面现象两者割裂开来。但必须表现出任何落后现象都要为不可战胜的新的力量所克服。因此“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是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决不可把在作品中表现反面人物和表现正面人物两者放在同等的地位。”同时英雄又是“只能从人民生活中去发现的而不能凭空地去虚构”。“英雄人物并不一定在一切方面都是完美无疵的”，“不当把英雄‘神化’或‘公式化’”但“必须把英雄人物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成长过程，性格上的某些缺点以及日常工作中的过失或偏差和一个人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的缺陷加以根本的区别”。“一个人物如果具有和英雄性格绝不相容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上的缺陷或污点，